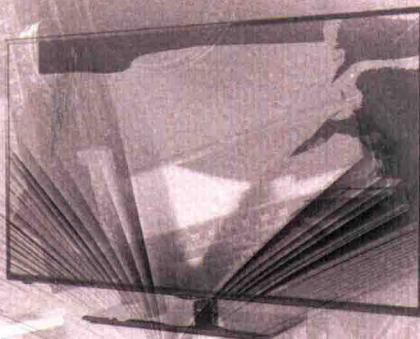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知识分子与电视：角色变迁、功能 转型及其反思（1988—2011）

◎ 张振宇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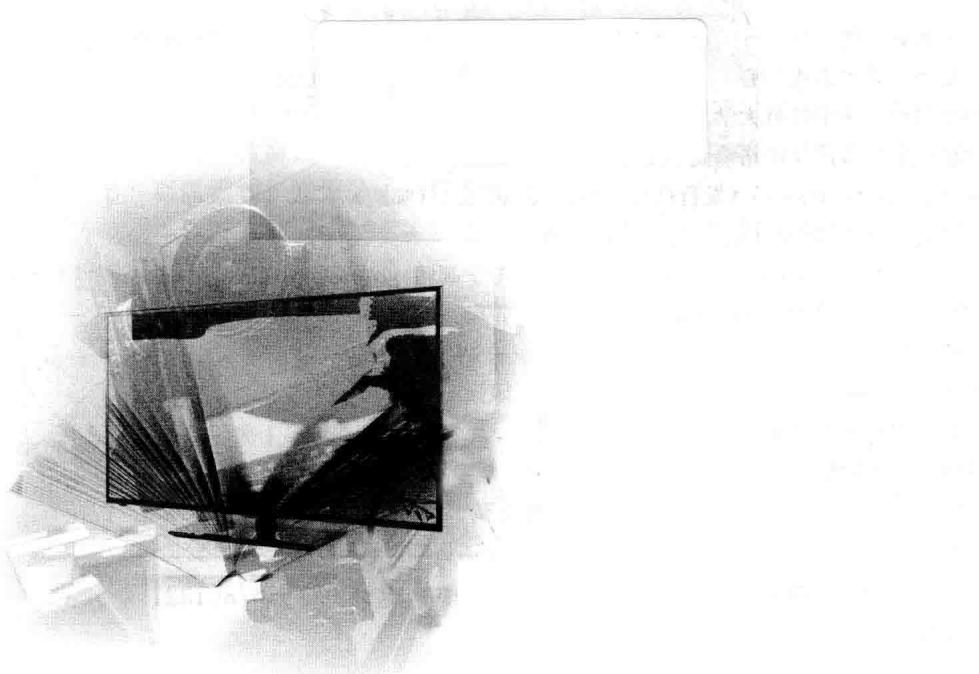
2014年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主编 / 江作苏
执行主编 / 喻发胜

知识分子与电视：角色变迁、功能 转型及其反思（1988—2011）

○ 张振宇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电视：角色变迁、功能转型及其反思（1988—2011）/张振宇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库）

ISBN 978-7-5622-6994-6

I. ①知… II. ①张… III. ①知识分子—关系—电视—传播媒介—研究—中国—1988～2011 IV. ①D663.5 ②G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6940 号

知识分子与电视： 角色变迁、功能转型及其反思（1988—2011） ◎ 张振宇 著

责任编辑：曾 艳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邮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194 千字

开本：710 mm×1000 mm 1/16

印张：11.5

版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在话语理论的观照下：转型期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	18
第一节 话语理论与媒介研究	18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其传播传统	24
第三节 社会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	30
第二章 “真实”的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电视纪录片中的话语实践	38
第一节 作为话语实践平台的中国电视纪录片	38
第二节 知识分子在“作家电视”中的话语实践	43
第三节 知识分子在纪录片中的“越位”与“淡出” ——从《河殇》到《望长城》	51
第四节 电视纪录片栏目化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实践 ——以《见证》栏目为例	58
第三章 从幕后到台前：知识分子在电视谈话栏目中的话语分析	66
第一节 幕后策划：知识分子的新角色 ——以早期《实话实说》和《艺术人生》栏目为例	66
第二节 借“书”发挥：知识分子作为谈话节目嘉宾的话语实践（上） ——以央视读书栏目《读书时间》和《读书》为例	77
第三节 现身说法：知识分子作为谈话节目嘉宾的话语实践（下） ——以人物访谈栏目《东方之子》和《大家》为例	88
第四章 心灵独白：知识分子作为主讲人在讲坛栏目中的话语实践 ——以《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为例	98
第一节 作为话语场的电视讲坛节目	98

第二节 “学术电视”的勇气：《世纪大讲堂》中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	102
第三节 再造“传统”的尝试：《百家讲坛》中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	110
第五章 反思与比较：对知识分子电视实践的进一步思考	128
第一节 自身群体与外在环境：对知识分子电视实践的两种反思	128
第二节 跨媒体的愿景：媒介形态对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影响	144
结语	160
参考文献	165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这本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这个研究选题的确定，则是受到了学者陈平原的启发：他自陈在研究时，“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除了纸面的严谨和理智，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同样值得关切”^①，所谓“压在纸背”，亦即“个人的经历、心事、性格和趣味”^②，因此，他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换言之，即是希望研究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专业研究中，这种研究趣味给了我在选题上的方法论启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电视”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实际上浸润着自己长期以来的一种关注。

高中时，喜欢看些闲书，也还能看看电视，一天偶然发现了《读书时间》栏目，喜出望外：原来电视上还可以读书！开始每期都看，直到感觉其内容日渐乏味，最终无声无息地从荧屏上消失。进大学后，在一节原本很枯燥的政治课上，老师宣布要放部电视纪录片，请大家结合课程内容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就这样，我看完了后来被认定为宣扬“全盘西化”的《河殇》，当时很惊诧于标记着“CCTV”的作品能有如此的“锋芒”，也第一次领略到电视荧屏上不容分说的“雄辩”力量。

到了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从文学转到了影视传媒，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很想从学理层面探讨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命运，于是，但凡发现有新的电视文化节目出

^① 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台湾二鱼版自序”，第6~7页。

^② 陈洁：《山河判断笔尖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4页。

现，总会锁定了频道认真收看，尽管很多时候都比较失望，但聊以自慰的是，电视媒体始终没有放弃在电视上进行文化传播的努力。虽然此类节目无法达到和新闻、娱乐两大品类电视节目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它的存在毕竟给充满了政治话语和商业话语的电视增添了几许文化气息，也让人觉得施拉姆（Wilbur Schramm）当年对大众媒体“传承社会文明”^① 的期许并未完全落空，特别是 2006 年《百家讲坛》栏目的大放异彩，更让我对电视文化节目的未来增添了些许信心。

等到博士论文开题时，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几经推敲，最终选择了以纪录片、谈话栏目和讲坛栏目这三类节目形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话语分析的途径来研究知识分子在电视上进行文化传播的媒介实践，力图揭示的核心问题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电视媒体中进行了哪些话语实践？其发展的轨迹是怎样的？与社会变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进而尝试着去回答：电视媒体与知识分子之间应该如何进行合作，通过面向大众的话语实践去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国家的文明进程。定下题目时，才蓦然发现，原来这就是我从硕士时起就想做的题目，此前不经意间的种种关注，仿佛都是在为此做准备，胡适说“功不唐捐”，也许正是这个意思吧。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这个选题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也是我选择研究它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有着参与现实的入世情怀，不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无不是想将自己的精神传播出去；而在现代报刊等大众媒介诞生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更为便捷和更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特别是电视乃至网络媒体普及以来，媒介形态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传播方式——他们不再需要依附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来自上而下地“兼济众生”；处江湖之远，同样可以通过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实践，直接面对大众“传道授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电视上的话语实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虽然它从来都不是电视话语的主流，但却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并影响着中国电视的媒介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如果从传播学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本书希望实现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电视纪录片、谈话节目和讲坛节目这三种节目形态的话语分析，来描述和阐释中国

^① Wilbur Schramm & William E Porter, Men, Women, Message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

知识分子的电视实践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并从“政治—经济”的深层结构中，抽象出知识分子在现行媒介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制约下与电视传媒“良性互动”的运作方式及规律，以期能够为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与电视媒介“共谋”时遭遇的种种问题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而从电视研究的应用性角度看，本题的研究价值则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电视媒体的角度看，通过对过去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研究，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传播价值，从而更好地与其展开多方面的合作，在资源互补的基础上实现媒体自身的发展壮大；二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通过对电视媒体及其媒介产品的类型研究，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传媒的形态特征与运作方式，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媒介实践中，利用这一大众传播平台，更有效地行使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涉及领域比较广，既有艺术学和传播学领域的电视研究，还有社会学和文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研究，而且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知识分子参与媒介实践的现象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书将依次对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叙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就目前能够检索到的范围而言，国内（包括港台）^①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这也与现实中知识分子参与电视实践的时间基本吻合，较早的文章有何东的《电视“知识分子”》和周安华的《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②等。严格地说，这些文献算不上学术论文，而只是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随笔，其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关注到“知识分子上电视”的现象并提出了“电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③，而且对其中暴露出的追名逐利、滥用话语权等文人病症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后来，随着知识分子对于电视媒介实践的介入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改版并取得较大社会影响力之后，相关研究不仅在文献的数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国内论文的检索主要以中国期刊网（CNKI）为主，但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本书还对《新闻学研究》（台湾地区）和《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地区）这两本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进行了逐期查找，并发现了一些相关论文，详见下文。

^② 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97年第5期《天涯》杂志和1998年第2期《文艺争鸣》。

^③ 学界通常认为这一概念最早是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但该书的法文版1996年才出版，2000年由许钧译介到国内，且两位作者均未表示借用了布氏的概念。

量和种类上有所增加，学理深度也有很高的提升，诸如陈平原、陈力丹、赵勇、时统宇、俞虹等优秀学者都撰写过相关学术论文，还出版了一些专著。

在论文方面，代表性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①：

1. 与本书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电视与知识分子（学者）的关系研究

此类文献的内容主要是就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进行合作的现象、动因、意义和策略进行评判和分析，大多数采用了思辨性的阐释研究范式，按照观点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赞成倾向为主，例如陈丹青的《也谈学者上电视》^②、郭五林的《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③等；第二类是以批评倾向为主，例如赵勇的《学者上电视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④、陈力丹的《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⑤等；第三类持中立观点（或曰有条件的赞成和反对），例如陈平原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⑥、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⑦等。

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较为深入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的互动关系，不论是陈丹青以国际化视野对中国现实的热切观照，还是赵勇对于中西文化差异与知识分子类型区别的严谨论述，抑或是陈平原立足于历史角度和现实经验的冷静剖析，均以扎实的论据支撑鲜明的论点，并在相互间的观念交锋中碰撞出精彩的思想火花，有助于后学者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进一步思考这一现象。

此外，还有少数文章采用了实证研究范式，例如采用“深度访谈”这一质化研究方法的《新闻点评的异化——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相互介入及其方式》^⑧，在量化研究方面，则有内容分析法的《学者明星的媒介形象分析》^⑨ 和

^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检索出的相关文献数量太多，且水平良莠不齐，无法也无须逐一论及，因此下面的研究现状综述主要立足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

^② 陈丹青：《也谈学者上电视》，《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第49页。

^③ 郭五林：《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当代传播》，2003年6月，第32页。

^④ 赵勇：《学者上电视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新闻学研究》，2008年7月，第261页。

^⑤ 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年2月，第31页。

^⑥ 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5月，第4页。

^⑦ 时统宇：《试论“电视知识分子”》，《现代传播》，2003年2月，第1页。

^⑧ 叶慧珏：《新闻点评的异化——大众传媒和专家学者的相互介入及其方式》，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

^⑨ 黄小漫：《学者明星的媒介形象分析》，《社科纵横》，2008年12月，第258页。

问卷调查法的《学者与媒体的关系调查》^①。这些文献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因此在材料和论证上都更加站得住脚，文章的切入角度也比较独特，并且取得了一些新发现，例如《新闻点评的异化》所归纳出的“操控、诱导、公关、互不介入、紧张的合作”等五种互动模式，《学者与媒体的关系调查》中发现学者更愿意和平面媒体打交道而非广电媒体，在接受采访时最看重“是否尊重原意”等。当然，与其研究成果相比，这些论文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显得更为突出。

2. 与本书所使用理论相关的文献——从话语角度进行的媒介研究

话语理论是本书的主要分析工具，因此在话语理论的框架下所进行的媒介领域研究也是本书所关注的范畴之内。在这方面的文献中最有价值的是发表在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上的四篇论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变迁：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线索》^②《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演变》^③《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④和《广告话语的结构重叠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以 1980 年和 2000 年〈人民日报〉的广告为例》^⑤。

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以费尔克拉夫的社会化话语理论（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为框架，对某一类媒介文本（例如新闻奖获奖作品、大众化报纸、报告文学等）的历时性变化进行细读和阐释，并与时代社会的变迁相互印证，在此基础上去进行更抽象层面的理论建构（如舆论监督话语对于旧有国家—传媒体制的重新建制、国家—社会关系在大众化媒介领域中的变化、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变迁等）。这几篇文献角度新颖，材料扎实，方法得当，最可贵的是都有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都通过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折射出社会层面的变迁，也从方法论层面证明了话语理论在媒介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与之相异趣，大陆学者在进行媒介话语研究时，却大都倾向于将话语视为

① 陆晓娅、彭泗清：《学者与媒体的关系调查》，《中国记者》，2002 年 10 月，第 31 页。

② 雷蔚真、陆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变迁：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线索》，《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 年（总第 6 期），第 143～166 页。

③ 孙玮：《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演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 年（总第 6 期），第 71～92 页。

④ 郭中实、陆晔：《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 年（总第 6 期），第 167～191 页。

⑤ 冯捷蕴、吴东英：《广告话语的结构重叠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以 1980 年和 2000 年〈人民日报〉的广告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 年（总第 2 期），第 161～177 页。

一个整体，在宏观层面去概括和把握某种话语（例如常见的主流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发展流向，而非立足于某一个具体文本的微观分析，例如何苏六的《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权与话语方式的演进》^①，就将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视为“政治化—文化—平民化—社会化”四种话语的演进，类似的文献还有《中国电视传媒的三种现代性话语及其建构》^②，也是从宏观上将中国电视的现代性话语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消费主义话语”。

这类文献的价值在于能够对中国媒介话语有一个高屋建瓴的认识，但同时不可得兼的就是对文本进行具体而微的话语分析，这使得此类研究停留在对中国电视的粗线条勾勒上，而缺乏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崇尚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③。在仅有的几篇针对具体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中，也是静态地探究其中话语的内涵，例如《电视的历史话语方式——看〈百年中国〉》^④ 和《多维话语较量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⑤，并未对话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这也使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较为遗憾。

还有一些文献则将关注点放在话语与权力、公共话语空间等问题上，这类论文更偏重于社会学研究，主要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来对媒介中的话语权分配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研究，例如，《关于谈话节目的公共话语空间》^⑥《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⑦《从权力话语到公共话语的迁移——试析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话语权分配格局的嬗变轨迹》^⑧ 等。这类研究对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超越了对电视节目的本体研究，而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层面，去探析电视节目话语中所反映的

① 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权与话语方式的演进》，《电视研究》，2009年第4期，第32页。

② 张兵娟：《中国电视传媒的三种现代性话语及其建构》，《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第179页。

③ [美] 格尔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文化的解释》，那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④ 朱羽君：《电视的历史话语方式——看〈百年中国〉》，《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第60页。

⑤ 陈立敏：《多维话语较量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今传媒》，2010年第9期，第79页。

⑥ 李嘉：《关于谈话节目的公共话语空间》，《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156页。

⑦ 邢勇：《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第86页。

⑧ 姜可雨：《从权力话语到公共话语的迁移——试析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话语权分配格局的嬗变轨迹》，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权力问题，显得更有理论深度和现实批判意义。

3. 与本书研究对象相关的文献——电视精英文化（文化类电视节目）研究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国内学界一般都将电视上的文化形态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类型，而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一般都是在精英文化的范畴中进行，其实践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电视文化节目中，因此，有关电视上的精英文化及其表现形态（电视文化节目）的文献也是本书需要重点了解的研究现状，按照研究向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第一类是宏观向度，即将电视精英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放置在电视文化乃至媒介文化的大框架中，去研究其存在的方式与意义、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未来发展的策略与路径等。总的看来，这些文献都是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电视上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精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表示担忧，虽然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有所差异，但却都意识到精英文化被逐渐边缘化的事实，并想通过对精英文化重要性的论证，来捍卫和提升精英文化在电视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代表性论文有《电视文化雅俗的历史反视》^①《电视精英文化边缘化及其出路》^②等。这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在于为人们认清电视上的精英文化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视野，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电视精英文化的现状、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路径。但缺陷则在于过于笼统，没有去辨析电视上精英文化内部不同表现形态的差异，在进行宏观论述的同时，也遮蔽了具体文本的精妙细微之处。

第二类是微观向度，这类研究是通过对某种类型或某一档的电视文化栏目进行个案研究，来阐明精英文化在电视节目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及其得失，有些文献也会力图通过对某些电视文化栏目成功因素的分析，抽象出精英文化节目的发展策略。在研究方法上，这类研究一般都是以阐释学方法，通过对节目进行文本分析来总结、归纳其特点和探究其深层次意义。这里面，代表性的文献有：《电视精英文化生存价值辨析——开坛、羊肉泡馍与总统套房的断想》^③，以《开坛》栏目为例论述了电视精英文化栏目的价值与发展策略；《电视时代如

^① 王黑特：《电视文化雅俗的历史反视》，《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第46页。

^② 王润兰、何文茜：《电视精英文化边缘化及其出路》，《中国广播电视台学刊》，2008年第6期，第80页。

^③ 俞虹：《电视精英文化生存价值辨析——开坛、羊肉泡馍与总统套房的断想》，《中国广播电视台学刊》，2005年第10期，第48页。

何读书——从《读书时间》谈电视读书栏目》^① 和《荧屏上的文化版图——中国电视文化栏目研究》^② 用类型研究的方法，从栏目的定位、选题、结构形态、电视语言、美学风格和市场意识等多个层面，对节目的本体内容进行了全面透析；《文化类电视栏目评析》对不同类型的电视栏目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并结合媒介技术进步和国际化视野对文化栏目的未来进行展望；《精英话语的文化突围——军旅题材电视剧意义解读》^③ 则通过对军旅题材电视剧中的对白、人物形象以及历史阐释的解读，饶有趣味地挖掘出电视剧文本中被压抑的精英文化和被隐藏的精英话语，充分地展示了话语分析在电视剧研究中的阐释力。

总的看来，这些文献围绕着电视与知识分子等相关主题，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切入，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本书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不少材料、观点和方法的刺激与启发，特别是发表在港台学术期刊上的几篇相关文献和陈力丹、俞虹、时统宇、赵勇等优秀学者的高水准论文，它们既是本书所仰仗的学术资源，也是本书所希望学习的标杆。但就全部文献而言，难免存在一些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考虑到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在此稍作评析：

(1) 就其整体的研究思路而言，多数文章的论述框架都在“事实描述—特点概括—价值判断—原因探析—出谋划策”这一常规化思路中进行，缺乏多样化的创新。思路的单一导致了论述的浅薄，不少论文都花费大量笔墨去进行表层的经验总结，虽然也能覆盖到上面框架中的一点或几点，但这种概括性的主观论断很难深入，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多是一些言之成理的个人感受而已，这些简单的重复也很难将研究逐层推进。

在研究方法上，思辨研究占据了全部文献的主流，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也是以个案研究法和定性的内容分析法为主，即便是在极少数采用深度访谈、内容分析、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的论文中，也存在研究设计上的一些缺陷，例如《新闻点评的异化》中访谈对象只有 7 个人，《学者明星的媒介形象分析》

^① 张同道：《电视时代如何读书——从〈读书时间〉谈电视读书栏目》，《中国电视》，1999 年第 7 期，第 34 页。

^② 张同道：《荧屏上的文化版图——中国电视文化栏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6 期，第 89 页。

^③ 王黑特：《精英话语的文化突围——军旅题材电视剧意义解读》，《当代电影》，2008 年第 4 期，第 89 页。

在一些分类细节上有问题，而《学者与媒体的关系调查》的样本量严重不足——发出74份，收回34份，这显然会极大影响其信度和效度。因此，研究方法上缺乏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成果的同质化和浅薄化。

(2) 就其文献的理论含量而言，国内研究过于倚重国外理论，而缺乏本土的理论建构。除了发表在港台学术期刊上的几篇文献之外，发表在大陆期刊上的很多文献还停留在以本国实践来印证国外理论的阶段，鲜有自觉的本土理论的建构意识。引进和吸收国外理论本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本土理论建构，更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来批判中国现象，而不顾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例如，在研究电视知识分子的文献中，很多文章都引用了布尔迪厄的理论观点，但只有极少数文章注意到中法两国在电视产业属性和知识分子发展历程上的差异，因此对布氏的理论应该采取批判性接受的态度^①。此外，大多数研究都是就事论事，追逐热点，却缺乏历史的观照：看见《百家讲坛》火了就研究它，却鲜有人思考，讲坛栏目与以前的电视课堂节目有什么内在的延续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电视实践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才发展为今天的样子？如果对这些历史问题没有弄清楚，几乎不可能上升到理论建构的层面。

(3) 即使在大陆顶尖学者的高水平研究文献中，也留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陈力丹认为，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简单几句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教授出面来讲……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②。在这里，陈力丹有些忽视了人格符号的传播力：其实教授身份作为一种权威信源，即便说的只是常识，其传播效果也会比普通人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再如，赵勇认为，《百家讲坛》只选择学问型学者而非思想型学者，因而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席，但这种观点只是放在与西方进行对比的框架下得出的，却没有以历史的眼光看到：能够让学问型学者上电视做一些文化普及和启蒙的工作，这本身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时代进步；就其功能而言，虽然《百家讲坛》无法让知识分子上台去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批判，但至少能够让观众重新去关注传统文化，这也是有价值的；赵勇最后的结论是：在电视言路没有畅通之前，知识分子应该理性地选择不与电视合作，这种“独善其身”的传统观点显然缺乏

① 刘钫：《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发展现状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② 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年2月，第31页。

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担当——不能因为现存的种种困难，就放弃靠近理想的一点一滴的努力。当然，也正是这些文献中留下的罅隙，给本书提供了进一步深挖和拓展的可能。

在国内学者出版的专著中，与本选题关联度较高的有三本，第一本是李金铨主编的论文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①，收录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知识分子在报刊上进行政论活动的个案研究，作者既有历史学界的，也有新闻学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借助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来考量近代中国文人在报刊上的政治话语实践及其影响。尽管该书与本书的研究主题在关注时段（民国与现代）与媒介形态（报刊与电视）上均无重叠之处，但该书对本书研究提供了很多方法论层面的可供借鉴之处，例如应该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媒介文本中选择有价值的材料进行研究？如何以自由、民主、权利等核心观念来结构论文？如何透过文本抽象出知识分子与权力、媒介、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

另一本则是牛慧清的专著《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②，这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补充完善而成，全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在对社会转型、知识分子、电视媒体与电视受众等概念进行学理阐释的基础上，又从动力机制、互动模式、异化趋势三个向度对知识分子参与电视实践的动因、方式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以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与电视媒体进行良性互动的策略作为全书结论，整个研究结构整饬，材料丰富，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素材和思路。该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和观察法，较少具体节目分析，而本书则是以阐释性的内容分析法为主，算是对牛著的一点补充。

第三本是张玉川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论》^③，该书将叙述重点放在“电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上，从其媒介化历程、所在的场域、话语特征、文化角色与社会责任等方面展开，有助于我们理解该群体的成因、内涵与功能，但该书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这一现象的反思力度稍显不够，这也是本书希望去尝试的。

此外，还有一些电视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涉及本论题的研究，例如荣耀军的《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多维话语系统的竞争与共生》^④、隋岩的《当

^① 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牛慧清：《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张玉川：《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论》，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

^④ 荣耀军：《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多维话语系统的竞争与共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

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①、孔令顺的《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②等，这些著作多数是将精英文化视为电视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然后研究电视中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对本书而言，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电视文化格局，也很有启发意义。而邢勇的《真实的背后——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分析》尝试了将话语理论引入到电视纪录片的研究，沿用了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三分法与费尔克拉夫的“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分析模式，对梳理中国纪录片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比较有价值，但存在一些学术规范上的问题。此外，尚未发现研究电视媒体中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专著。

除了电视传媒研究领域之外，在人文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些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兼及其与大众媒介关系的论著，例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③，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④，郑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⑤等。这些文献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从其他学科（社会学或人文科学）来对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视角，将知识分子放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和社会的坐标系中，更加全方位地对其进行学理层面的透视，从而有助于本书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进行话语实践的动因和方式。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为了能够了解本选题在国外的研究现状，我使用了 ISI 和 Pro Quest 两大学术检索平台进行搜索，最终找到相关的学术论文 8 篇，博士学位论文 3 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研读和对国外学者一些专著的分析，大致能够窥见国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术期刊（专业学术会议）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西方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在电视上的话语实践研究。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的论文很少探讨抽象的知识分子与电视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对具体媒介产品的分析，来反观知识分子通过参与电视实践对媒体、社会乃至其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From Text to Image: Philosophy and the Television Book

① 隋岩：《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年。

② 孔令顺：《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④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

⑤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

Show in France, 1953-1968^①，该文研究法国在1953—1968年间播出的哲学和读书类电视节目，总结其在不同年代所体现出的不同侧重等时代性特征。Public Television and Empowerment in Taiwan^②，该文研究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认为在民主化进程中，公共电视平台上的知识分子精英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还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以此为研究主题：Embodying the Mind: French Philosophers on Television, 1949-1999^③，内容是研究1949—1999年间法国哲学家在电视上的传播活动，并以每十年为时间段，归纳了不同年代电视精英文化传播的不同特点；另一篇是 Rene Dubos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④，论文内容是以法裔美籍微生物学家 Rene Dubos（勒内·杜博斯）在美国借助大众媒介传播科学知识为案例，探讨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和接受过程。

第二类则是电视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或曰高雅文化 high culture）研究，按照其研究进路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的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献：Low Television, High Fidelity: Taste and the Gendering of Home Entertainment Technologies^⑤，该文研究家庭影音娱乐技术对于电视节目品位与类型的影响，其中提到了媒介技术发展对于电视高雅文化节目的影响作用。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a Project of Modernity: The Example of Flemish Television^⑥，该文认为公共服务电视是现代化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并对上面的一些文化节目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有助于形成民族的身份认同。The Use of Television Series in Health Education^⑦，研究了电视连续剧中包含的精英文化，并认为它能够在健康教育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 on Cultural Valu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ird World

① Tamara Chaplin Matheson, From Text to Image: Philosophy and the Television Book Show in France, 1953-196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05 (4).

② Rawnsley G D & Rawnsley M Y, Pacific Affairs, 2005 (1).

③ Tamara Chaplin Matheson, 2002年以此博士论文毕业于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④ Mark Francis Dreessen, 198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

⑤ K. Keightley, Low Television, High Fidelity: Taste and the Gendering of Home Entertainment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3 (2).

⑥ H. Van den Bulck,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a Project of Modernity: The Example of Flemish Televis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1 (1).

⑦ F. Elkamel, The Use of Television Series in Health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1995 (2).